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0 / 2 (总第二十二期)

- 巴里·布赞 中国能和平崛起吗?
- 张 锋 解构朝贡体系
- 陈 冲
刘 丰 美国使用武力的决定因素 (1946—2006)
- 王树春
朱 震
- 吴文兵 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科学价值的质疑
- 刘若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进展与困境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世界·中国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政治科学(总第 22 期)/阎学通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12 - 3864 - 4

I. ①国… II. ①阎… III. ①国际政治 - 丛刊
IV. ①D5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819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张 颖
封面设计 少 兵

书 名 国际政治科学(总第 22 期)
Guoji Zhengzhi Kexue

主 编 阎学通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10 印张
字 数 153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6 月第一版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864 - 4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巴里·布赞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教授,哥本哈根大学和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电子信箱:b.gbuzan@lse.ac.uk

张 锋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2004 和 2009 年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分别获比较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曾任《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编辑。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

电子信箱:fengzhangmc@gmail.com

陈 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nkchenchong@hotmail.com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 和 2009 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著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2009 年)。

电子邮箱:liufeng00@gmail.com

王树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1999 和 200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2002 年)、《经济外交与中俄关系》(2007 年)等。

电子信箱:wangshuchunf209@163.com

朱 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492765184@qq.com

吴文兵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1999 年在电子科技大学获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2007 年在新疆大学获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邮箱:wuwb07@mails.tsinghua.edu.cn

刘若楠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9 级硕士生。2009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liuruonan.crystal@gmail.com

中国能和平崛起吗？*

巴里·布赞

内容提要 在过去的二百年里，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几经变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政策的变化，中国与国际社会发展出的密切关系超出以往任何时候。但是，在未来的三十年里，这一政策是否继续有效？本文认为，中国从现在开始需要考虑究竟要推动何种类型的国际社会以及地区与全球的平衡。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但并非坦途，这涉及到中国如何思考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以及如何处理与日本的麻烦关系。

关键词 和平崛起 国际社会 身份定位

一、引言

本文回顾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position)，并且以

* 笔者在此对2008年12月16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者和参会者表示感谢，这次研讨会在总体上启发作者写本文并为文中一些特别的观点提供思想源泉。笔者还对张永进、潘忠歧和CJIP约请的两位匿名评审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终稿前对本文提出有益评论。

此为背景,评估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前景。笔者之所以坚持使用和平崛起这一说法,是因为相比近期在中国官方话语中取而代之的和平发展,用和平崛起表述这个议题更加准确^①。笔者认为,和平崛起意味着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在物质定位、身份(Status)定位以及与国际体系其他大国的关系上均有能力获得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不会在其自身与邻国或其他主要大国之间引发严重敌对。和平崛起包含一个双向进程:崛起国使其自身适应国际社会规则与结构;与此同时,其他大国以适应新的权力与身份分布状况的方式调整这些规则和结构中的一部分。笔者不打算探究中国是否会崛起,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研究^②。相反,笔者把中国继续崛起作为前提,在当代国际社会范畴中探寻中国是否有可能和平崛起。

接下来一个章节回顾英国学派关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文献,包括前欧洲时期、中国遭遇西方社会、20世纪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起起落落。第三个章节专门考察现状,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30年及其在和平崛起基础上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眼下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处于比20世纪70年代末更大的转折点,而且过去30年来相当成功的一些政策在下一个30年中将不再有效,继续和平崛起将变得更加困难。第四个章节展望未来,关注中国面临的三个国际政治和战略挑战:与美国关系,与日本关系,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这三对关系在某些方面大相径庭,但在国际社会区域(东亚)层次和全球层次上,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相互关联。这三对关系加起来将对和平崛起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在笔者看来,这三对关系在均对中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提供机遇。笔者认为,中国领导层需要抓住这些机遇,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机遇将依然是问题,而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将变小。

笔者不是中国政治或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也不懂中文。因此,笔者主要通过英国学派这一理论棱镜回顾中国的国际定位以及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主要观点;此外,还有一些按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进行的分析,并且尝试把这

① Bonnie S. Glaser and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0, 2007, pp. 291-310.

② Yue Jianjong, "Peaceful Rise of China: 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5, No. 4, 2008, pp. 439-456.

种分析与国际社会联系起来。所谓国际社会,意指接受国家间充分共有、能形成一种社会秩序的深层次游戏规则。赫德利·布尔将其称为无政府社会^①,国际社会最可见的形式体现在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上,它们能够进化,以构成国际关系游戏及游戏参与者^②,界定哪些行为合法、哪些不合法^③。这些基本制度——比如主权、不干涉、领土、民族主义、国际法、外交、大国管理以及族群平等——由那些支持深层次、可持续惯例的原则、规范和规则构成。它们与人们更为熟悉的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比如政权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区别明显,后者出现时间离现在更近,具有工具性,主要是由政府设计、对现代国际关系潜在社会结构的表述。首要制度构成国际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充满活力并且总在进化中,尽管这种进化通常缓慢并伴随大量惯性。关于首要制度的论战——例如殖民主义、奴隶制、主权、不干涉、和人权——其本身就是国际社会进化的驱动力之一。这类论战同样界定任何给定时期内国际社会的形态和优点(或弱点)。人们可以在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的国际社会中找到这些专门术语,这一特点在整个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比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自由主义(次级制度)及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英国学派研究路径为理解国际关系有什么样的结构、这种结构如何运转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描述。在笔者看来,相比任何其他替代性研究路径,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为研究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开放、平衡且有细微差别的视角。在对权力分布保持敏感的同时,它能够避免那种伴随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宿命论性质和物质性冲突假定,能够使人们分析一些论述,比如哈利迪(Halliday)所说“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关系中都没有类似通往现代化的和平道路那样的事物”^④。通过考察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英国学派研究路径也能避免自由主义那种赋予次级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太多重要性的乌托邦式倾向。国际社会的结构复杂、不均衡、充满争议并且总在进化中。这使得英国学派的

①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②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Law to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1-270.

③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Fred Halliday,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xth Great Pow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p. 2. 也可参见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观点没有“极”那样简单明确,但在涉及中国崛起这种深层次问题时,“极”这种显而易见的简约并不准确。社会结构这种视角更突出细微差别、植根于历史,有助于更加深入考察中国如何在全球和区域层次上与国际社会发生关联,更清晰考察这些不同层次关联之间如何相互联系。正如笔者将在下文中所展示的,现在英国学派也已经有一篇关于中国将在哪个层次建设国际社会的文献。

通过使用这些工具,笔者希望既能提供一种局外人关于和平崛起的视角,也能提供一种或许能与中国内部话语相联系的议题设定方式。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中国崛起这个话题太重要,以至于既不能用一种过于简洁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也不能遵循民族主义式的自我理解。和平崛起不能单靠中国来完成,而只能靠中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协力创造必要条件。因此,本文从回顾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如何展开的历史开始颇为有益。

二、回顾过去

英国学派关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文献涵盖4个时期:(1)西方的存在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2)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试图适应西方国际社会并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3)革命时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疏远了西方国际社会并与之对立;(4)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段时期,中国重返一个更加全球化但依然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这段时期涉及中国试图改革并做出内部调整,以及西方国际社会内部变化和全球化进程导致的国际社会进化。

就第一个时期而言,少有文献考察西方的存在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①。就像大部分关于中国历史的西方国际关系文献那样,沃森(Watson)主要关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

^①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85-93;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et al., eds.,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3-63;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China and Japan's Encounter with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34-55.

中国在这段时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其无政府性较欧洲历史更为典型。沃森和张永进通过考察主权、外交、军事和国际法元素(礼仪)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社会机制。尽管沃森同样发现,相对均势,许多国家更倾向于搭便车^①。学界较少关注历时更长的中华帝国时期。这段时期内,中国具有超级大国的单极地位,处于宗主国体系中心。不过,这段时期现在开始吸引更多学者关注。沃森主要考察帝国式中央集权,而较少考察国际社会。张永进视朝贡体系为中华帝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社会的关键制度,并且说明这个体系如何因西方国家进入东亚而被完全摧毁。铃木省吾(Shogo Suzuki)更详细地探究儒教秩序的社会性质,涉及关于“中央王国”的争论,以及这种儒教秩序最终为西方国家和崛起的日本摧毁^②。中国国内也有学者开始推动这种儒教秩序的一些原则,使其成为一种更具集体主义、更和谐的替代性选项,以代替与中国传统思想冲突的、大部分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包含的个人主义^③。为填补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空白,学界应当做更多工作,既研究帝国时期,也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以丰富关于比较国际社会的文献。但是,就本文写作目的而言,关键是与西方的遭遇摧毁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而且要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迥异的、外部强加的国际秩序做出让步。中国被动地从一个帝国向一个普通国家转变、从中心变成外围的一部分。

接下来回顾关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中国“遭遇”西方国际社会具

①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88.

②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pp. 34-55, 148-176.

③ Song Xinning, “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6, 2001, p. 70;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6, 2001, pp. 37-38; Yan Xuetong, “Xun Zi’s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1, 2008, pp. 135-165; Zhao Tingyang, “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 (Tian-xia)”, *Social Identities*, Vol. 12, No. 1, 2006, pp. 29-41; Li Mingjiang, “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2, 2008, p. 292. 也可参见 William A. Callahan, “Remembering the Future—Utopia, Empire, and Harmony in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4, 2004, pp. 569-601 and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08, pp. 749-761.

体情况的文献。在中国人眼中,这段时期堪称“百年耻辱”^①。这段时期之始,中国不再有能力抵抗西方军事压力,同时内部不断分裂,沦为半殖民地,先是受到西方列强和沙俄压迫,接着受到日本(日本对现代化和西方国际社会的接受与适应比中国更快也更成功)压迫。至20世纪中叶,尽管仍陷入大规模内战,但中国已经以平等条件融入西方国际社会,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甚至获得正式的大国地位,尽管这种大国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更属于荣誉性质,而非真实能力的反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好比西方国家内部以非常野蛮行为进行的内战,削弱了“文明标准”,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②。这篇文献认为,从1911年(中华民国诞生)到1920年(加入国际联盟)、再到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的不同时期,中国或许已经令国际社会相信,它已经超越二等国家地位、完全融入国际社会。

对第二个时期进行研究的文献考察了中国向由西方设定的“文明标准”妥协的尝试,以及中国内部围绕是单靠努力重新获得大国地位、还是进行更深层次现代化改革来实现这一点产生的分歧^③。这些文献还考察了西方国家内部对“文明标准”的动摇不定和最终遗弃。江文汉(Gerritt W. Gong)对“文明标准”的重要研究认为^④,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张要求认同观念不断变化,从“基督教徒”,到“欧洲文化”(19世纪对美洲定居国进行殖民化期间用来吸引美洲人和其他欧洲后裔^⑤),最终在19世纪末非西方国家开始符合融入国际社会的条件时^⑥演变成“文明标准”。这些变化反映出一种针对其他文化的文化傲慢(堪比伊斯兰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以及平等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必要性,后者要

①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36-163; Gerritt W. Gong, "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71-183; Zhang Yongjin, "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yond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1, 1991, pp. 3-16; Zhang Yongj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esp. pp. 56-113.

②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158-169.

③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④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⑤ 同样可参见 Adam Watson, "New States in the Americas",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7-141.

⑥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4-6.

求符合某种标准的有效政府,尤其是有能力满足法律上的互惠义务^①。19世纪内,国际社会自身也在不断进化,最为显著的是民族主义上升、市场成为新的制度,这些同样属于这类情况^②。

江文汉在论述“文明标准”时明确陈述了文明的冲突,以及这种标准如何制造压力,要求非西方国家服从西方价值观和惯例。西方价值观和惯例在文化上对非西方国家构成巨大挑战,许多非西方国家为争取融入国际社会,不得不违背自身文化传统。正如铃木省吾所说,西方国际社会有两面性,一面是其在西方成员内部体现更加有秩序、更平等的特点,另一面则是不平等且采用强迫手段对待外来者^③。这种两面性为国际法遗留下一个依然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一些人至今仍然认为国际法反映的是西方帝国主义价值观^④。江文汉解释说,正是欧洲人的需要(贸易、改变信仰、旅游)驱动“文明标准”发生功能性变化(保护在其他国家欧洲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进而要求当地人不能或不愿意提供的治外法权和不平等关系^⑤。非殖民化为作为一种国际社会机制的殖民主义^⑥和文明标准画上句号。随着民族自决权和主权平等成为几乎无条件的准则^⑦,西方帝国的相继解体并不真正质疑融入条件这一问题,这与较早期“遭遇”西方国际社会的国家已经做过的方式毫无相同之处。江文汉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考察,后来又有其他几位学者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当代西方国家那些出于关心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人权主张与“文明标准”相当类似,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文明标准”在当代的延续或重生^⑧。

第三个时期涵盖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这一时期看起来或许处于和

①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64-93.

② James Mayall,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③ Shogo Suzuki, "Japan's Socialization into Janus-Fac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1, 2005, pp. 137-164;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④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7-21.

⑤ Ibid., pp. 24-53.

⑥ Edward Keene, *Beyond the Anarchical Society: Grotius, Colonialism and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alevi J. Holsti, *Taming the Sovereig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⑦ 同样可参见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296.

⑧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90-93.

平崛起的对立面。关于国际社会的文献中,这一时期相对受到忽略,或者至少被包含在其他课题(冷战、革命)下。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取得胜利后,中国放弃先前融入国际社会的政策,在冷战中站到西方的对立面。冷战本身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集团与共产主义集团之间关于未来国际社会形态的一场重大冲突。这段时期内,西方国际社会经历重大转型,通过非殖民化和反对纳粹主义让“文明标准”走到终点。共产党中国在把自己置于西方国际社会对立面的同时,它的外交工具(machinery)实际上也遭到取代,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仍由遭到失败的台湾国民党政府占据,许多国家仍然只承认台北的政权。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由张永进进行,他详细描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西方国际社会的对抗^①。他认为,1949年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有20年的时间疏远(而非孤立于)国际社会,其间,美国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中国反对西方主张,两者相互作用。但即便在这段时期,中国依然发展了广泛的对外政治和经济联系,为与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和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席位铺平道路。哈利迪注意到,中国起初在对外政策上主动跟随苏联,即便在与莫斯科决裂后,中国仍然对试图输出它的模式或建立一个亚洲第五国际不怎么感兴趣^②。中国对其他国家左派的影响更多出于观念和榜样的力量,而非培植盟友和支持者。即便如此,哈利迪和阿姆斯特朗^③均注意到,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而与苏联决裂后,这种支持更多体现为意识形态竞争。从1970年开始,中国拾起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社会话语,减少使用先前那些激进年代以阶级为基础的话语。相应地,随着“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提出,中国放弃经济上的自我依赖。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年代那种极端激进主义不但使中国元气大伤,而且把中国至于严重安全威胁下,在国内引发反作用力,后者有力推动了中国重新与国际社会接触^④。

这种反作用力为最后一个时期提供有力支撑。这一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直至今日,关键主题为“改革开放”,中国内部改革推

① Zhang Yongj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② Fred Halliday, *Revolution and War Politics*, pp. 110-116.

③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ar Politics*, pp. 176-184.

④ Ibid., pp. 182-184; Song Xinning, "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 62;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p. 35.

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转型。“改革开放”迄今依然是支配中国政治的观念^①。实际上,中国放弃了许多对抗西方的革命性做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前10多年时间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重新开始1949年以前在国内改革基础上通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但这种类比并不精确。在这个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时期,中国是从一个比1949年以前的时期更为强大的位置行动,因此,当今中国是内部改革推动对外政策变化,而非以前由外部压力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道路也比非殖民化运动以前更加开放。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在前进。中国视自身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并且由此得出,这需要在区域和全球层次上均保持对外关系稳定^②。朝着这个目标,毛泽东时期那种深切敌对西方统治现状的革命性崛起政策令人瞩目地迅速转变为邓小平时期在现状内和平崛起的政策。张永进看到,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稳步地使自身适应国际社会并与其融合,自1971年开始以外交学徒面貌视人,而非在国际组织中充当革命者,并且主要在经济上融入国际社会^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把国内事务解决到足以允许它以一种非革命者的姿态在政治上参与国际社会^④。但中国一直在追寻一个不断变动的目标,而且,当诸如人权、“良政”等创造出一套新的“文明标准”时,给中国相当成功地采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标准与机制平添压力,使中国再次面临遭到疏远的危险^⑤。正如中国第一次“遭遇”西方国际社会时,中国并不接受完全西化,而是试图寻找一种稳定且可行的现代化改革与“中国特色”的混合方式。

这种普遍认同的视角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他们同样既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急转弯”,也看到中国适应国际社会

① Jeffrey W. Legro, "What China Will Want: The Future Relations of a Rising Power",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 Vol. 5, No. 3, 2007, pp. 505-534.

② Zhang Yongjing,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pp. 102-25, 194-243.

③ Ibid., pp. 73-91.

④ Ibid., pp. 91-125.

⑤ 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2006, pp. 77-94.

与国际社会自身进化之间不断延续的紧张^①。秦亚青认为,这种“急转弯”式的变化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内部发展驱动,其间这个国家经历国家认同、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界定相当深刻的变化,所有这些共同改变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最核心的变化是把国家经济发展列为首要任务,因为这推动中国脱离早先对待国际社会的革命者态度,朝着一种更像现状国家的定位,体现为参与许多国际机制,接受大多数普遍流行、管理区域与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把发展放在首位意味着中国需要转变它的安全利益,从支配先前几十年、强调斗争与零和冲突的“军事—政治—领土安全”,变为强调维持稳定、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更具合作性的“综合安全”。比森(Beeson)补充说,综合安全也包括一种经济增长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政权安全考虑之间的紧密关联^②。尽管秦亚青承认,老式的“军事—政治—领土”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有可能打乱过去 30 年的发展进程,但他认为,在其他方面,中国正变成一个主要的现状大国,不断接受国际社会,不仅重视国际社会的工具作用,也接受国际社会的观念。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经历重大转型,中国国内变化为这种转型提供主要解释,这一点清楚且没有争议。这种转型在许多方面已经成功实现,这一点也比较清楚。在区域层面上,多数东南亚邻国普遍把中国视为“好公民”,此外,在经历一个比较犹豫的开始后,中国已经较好地融入围绕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区政府间组织^③。中国与朝鲜和韩国保持良好关系,近期甚至与台湾的关系也在改善。尽管经济关系密切,但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依然面临困难(下文将进一步分析),对东亚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中

^① Wu Xinbo, “China: Security Practice for a Modernizing and Ascending Power”,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5-156; Rosemary Foot, “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2001, pp. 1-19; Qin Yaqing, “Nation Identity, Strategic Culture and Security Interests: Three Hypothe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IS Journal*, No. 2, 2003, <http://irchina.org/en/xueren/china/view.asp?id863> (2008 年 12 月 4 日访问); Qin Yaqing,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East Asia”, transcript of a talk and discussion for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7 July 2004 <http://www.spf.org/e/report/040707.html> (2008 年 12 月 4 日访问)。

^② Mark Beeson, “Hegemonic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1, 2009, pp. 95-112.

^③ *Ibid.*, p. 104.

国与许多邻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它们以相当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式观点看待主权与不干涉，把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渴望保持区别于他人的文化价值观，承诺通过贸易和投资共同发展。更为广泛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国家在区域层次上比全球层次更重视主权和不干涉，而且它们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更倾向于等级体系、搭便车，而非均势^①。所有这些均显示，一个独特的东亚区域性国际社会已经部分成形。

全球层次上的形势更加复杂。中国在寻求从经济上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最显著的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②与核不扩散作出部分贡献，但从政治上说，它的定位一直相对边缘化。尽管拥有大国地位，但中国是世界主导国家中唯一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承诺民主的国家，对西方支配的政治秩序许多方面感到不满。它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往往显得相当被动，主要关心保护自己的国内利益。它对人权、民主和干涉持防御姿态，到最近，它还在环境问题上采取守势。中国在政治上遭遇几次挫折，最明显的是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以及西藏问题。此外，在一些具体的国际合作领域，如太空科学，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排斥。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因许多反对霸权的言论充满荆棘^③。因此，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层次融入国际社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这种进展并不如它在区域层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在全球层次上，中国并没有受到与东亚地区那样有任何相同的“好公民”看待，正因为如此，中国对它在“软实力”上的弱势感到忧虑^④。

① 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7-85; David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3-4, pp. 165-180; David Kang, "Why China's Rise Will Be Peaceful: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3, 2005, pp. 551-554. For a critique, see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3-4, pp. 149-164.

②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Peacekeeping Role: Its Significance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SIPRI Policy Brief*, 2009, <http://books.sipri.org/files/misc/SIPRIPB0902.pdf> (accessed 13 March 2009); Shogo Suzuki, "Chinese Soft Power, Insecurity Studies, Myopia and Fantas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No. 4, 2009, pp. 779-793.

③ Wu Xinbo, "China".

④ Li Mingjiang, "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即便如此,相比多数其他近现代崛起的大国,中国过去30年的崛起看起来是和平的。德国、日本和苏联的记录相当符合哈利迪和米尔斯海默关于和平崛起不可能的断言。所有这三个国家对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排位提出挑战,苏联,以及更带争议的德国,还就根本游戏规则对现状提出挑战^①。作为谋取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努力的一部分,所有这三个国家把尽快壮大军事力量列为首要任务,然后侵略和占领它们的邻国。讽刺的是,就中国的和平崛起而言,最明显可以用来比较的国家是美国,尽管人们并不愿意过于深入讨论这一类比。同中国相似,处于崛起阶段的美国试图从经济上融入世界,同时继续远离高级政治和均势,偏好经济发展胜过寻求世界级军事力量。同中国相似,美国拒绝承担领导责任,直到一些全球性事件迫使它这样做。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过去30年内,中国在寻求和平崛起上做得相当不错。中国从继承自百年耻辱时期和毛泽东时期反西方革命主义的贫弱位置出发。在注定要失败的苏联工程失败之前30年,中国开始摆脱这种工程,而且在冷战结束前10多年实现国内政策从革命主义180度转弯。除了那些可能提及的明显批评,更多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把一把差牌打得相当好。他们实现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国家财富和国力极大增加。与此同时,他们在最大程度上维持住国内稳定,没有在邻国或其他大国中引发真实且严重的安全忧虑。的确,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担忧中国崛起,但这些担忧并没有支配它们的对华政策,没有出现伴随其他大国崛起的军备竞赛或战争预期。换言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看起来已经摆脱那条最初看来注定重复德国、日本和苏联动荡式崛起的道路,开辟出一条与周边国际社会更加和谐的新道路。首先,苏联解体缓解了中国的安全困境,为中国在东亚和南亚活动提供便利。其次,中国过去30年的崛起恰逢世界经济一段相对稳定、开放和繁荣的时期(尽管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生数次区域性经济危机),极大促进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政策。

^①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ar Politics*, pp. 112-157, 163-164.

三、当前形势

如今的问题是,当前形势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有能力沿着过去30年的路程继续,或者这些形势意味着不同的挑战,需要不同的应对政策?解答这个问题的第一项任务是评估如何才能最好地描述当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秦亚青认为,中国正不断成为一个现状国家,不仅接受用来计算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而且在观念上接受游戏规则,因为它视这些为正确观念。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当然,这种看法看起来不仅在中国学者中,而且在一些美国学者中非常流行^①。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审视国际社会自身的条件,看看它自身正在经历的进化如何改变与中国一起进行的这场游戏。

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而言,秦亚青提出三种情况:修正主义国家、脱离国家和现状国家^②。他还是采用温特用来区分社会凝聚方式的卓越解释:强迫(强迫行为一致),计算(工具性自我利益)和信念(从观念上接受)^③。显然,中国不再脱离(不关心)国际社会,因此选项只剩下修正主义国家和现状国家。如果我们把修正主义进一步划分为革命主义、正统派主义和改革主义,还会得到一幅差别更加细微的景象^④。英国学派关于这种区别的文献明确指出,修正主义类别中有两个不同因素起作用:首先,一个国家是否满意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或排名,其次,它是否接受或争夺组成国际社会的机制。那么,是什么使中国当前在全球国际社会中的位置看来可以使用这些标准?

一个现状大国对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或排名以及国际社会的机制感到满意,在观念层次上接受这些机制。笔者怀疑这一点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

① Pan Zhongqi, "China's Changing Image of and Engagement in World Order", in Sujian Guo and Jean-Marc F. Blanchard, eds., *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York/Lexingt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pp. 39-63; Feng Huiyun, "Is China a Revisionist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3, 2008, pp. 313-33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② Qin Yaqing, "Nation Identity, Strategic Culture and Security Interests"; Qin Yaqing,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Hemel Hempstead: Wheatsheaf, 1991), pp. 237-246.

况。自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它几乎被定义为不满并试图提高自己的地位或排位,使之符合自身财富和实力。中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却不是八国集团成员。另一点明显的是,中国并不完全满意西方支配的国际社会的所有机制。对那些多元主义性质的共存机制——主权、不干涉、民族主义、领土、反对霸权或反对均势,外交、国际法,中国给予强力支持;对那些自由派政治社会连带主义观念——人权和民主,以及最近的环保主义,中国强烈反对。除反对单极和霸权主义外,尚不清楚中国在多极化大国管理这一观念上究竟持何立场。尽管渴望提高它的大国地位,但中国看起来并不打算声称会发挥领导作用,相反,中国总是谈论国际社会应在所有层次的大国之间更大程度实现民主化^①。中国对市场支持的性质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坦率地说,一个共产党政府能如此在观念上支持市场吗?或者这种支持必然是必须的,而不是精心计算的?正如勒格罗所预见的,一场真正严重且持久的全球经济危机——如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危机这般——或许能使人看清中国对市场的承诺和“改革开放”到底是工具性还是观念性^②。

一个革命性修正主义国家在观念基础上反对国际社会的首要机制。它希望或者退出(秦亚青称之为“脱离”),或者成为新的先锋,挑战国际社会主要规范性内容,并且试图推翻现行地位秩序和国际社会的形式。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显然属于这一类别,但现在显然不是。

一个正统派修正主义国家总体上对国际社会机制性结构和观念性内容感到满意,但与现状国家不同,它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感到不满。在某些方面,中国符合正统派修正主义国家的描述。国际地位显然是中国主要关切的对象之一,中国也的确接受的当前国际社会的许多机制。但这种描述也有问题,因为正如上文所述,中国依然挑战一些机制,或者对其态度含糊。

一个改革型修正主义国家出于计算和工具理性的混合考虑,接受国际社会一部分机制,但它反对并且希望改革其他机制,可能还希望改变它的地位。这听起来是对中国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定位的最好描述。中国在观念基础上接受

^① Hu Jintao, “Build Towards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speech to the High-level Plenary Meeting of the UN’s 60th Session, 15 September 2005,” pp. 1-5, <http://www.fmprc.gov.cn/eng/wjdt/zyjh/t213091.htm> (2009年1月19日访问)。

^② Jeffrey W. Legro, “What China Will Want”, pp. 3, 5.